《中国书法报》走进西柏坡、正定

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西柏坡——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1949年1月6至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西柏坡召开，图为会议会址。

一部电话，二张地图，三套桌椅，四间小平房，五大书记。

西柏坡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主要包括三个阶段：全国土地会议的召开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土地改革运动的普遍开展、“左”倾偏向的纠正和土地改革总路线的制定。

一、全国土地会议的召开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结束时通过了由廖鲁言主持起草、经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后经中央修改，于10月10日正式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共16条。其根本目标是“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为此，作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定。

第一，废除与没收土地的对象。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以及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并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改革以前的债务。没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第二，关于分配土地的对象。规定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实行分配，并规定了分配中的一些特殊问题的处理办法。第三，关于分配土地的办法。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以乡或等于乡的行政村为单位）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得同等的土地。第四，地权及财产所有权问题。规定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利，土改前的土地契约及债约，一律缴销。大森林、大牧场、大荒地及大水利工程等归政府管理。第五，关于土地改革的执行机关和执法机关。规定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省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土改的合法执行机关。

二、土地改革运动的普遍开展

《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各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按照中央的指示，各解放区由党政军负责人主持召开了本区的土地会议，总结过去的土改工作，传达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布置土改工作。

但是由于党的土地政策的不完善和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平分土地运动中出现了一些“左”倾的偏向：扩大了打击面；侵犯了中农的利益；侵犯了一部分工商业者的利益；对地主、富农不加区别，排斥知识分子；乱打乱杀等。这些错误的倾向虽然历时仅仅两三个月的时间，但是使解放区的社会秩序、生产生活受到了一些影响，给解放区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三、“左”倾偏向的纠正和土地改革总路线的制定

12月25日至28日，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进行土地改革，“我们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并提出“这里必须注意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只要我们掌握了这两条基本原则，我们的土地改革任务就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

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中共中央从1947年12月到1948年上半年集中全力纠正“左”倾错误，解决在新形势下关于土改方面的具体政策和策略问题。中共中央接连向全党发出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关于在老区平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关于工商业政策》等一系列文件指示。中共中央在确定了纠正“左”倾错误的正确方向后，土改方面的“左”倾错误很快迅速解决。

西柏坡时期的土地改革对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加速战争胜利的进程起到了重大作用，同时，对乡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带来了巨大变化，已经远远超出了土地改革本身所要实现的变革农村生产关系的范畴。并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并深远地影响以后乡村社会几十年的面貌。

•领导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

•召开“九月会议”，全方位探索新中国建设

新中国的美好蓝图就是在西柏坡这个小山村绘制完成的，新中国大厦的基石也是在西柏坡这个小山村完成奠基的。1948年召开的“九月会议”和1949年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是对新中国美好蓝图的绘制和新中国大厦基石的奠基起到重大影响的两个关键性的会议。

在革命形势发展的历史转折关头，为了适应革命战争形势的发展，确立新的战略任务和战略决战方针，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中心议题之一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九月会议”在认真总结检查党在过去时期各项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夺取全国胜利的任务和建设新中国的奋斗目标。会议尤其针对党内存在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以及地方主义、游击主义倾向，特别强调了要进一步切实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把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党中央和中央代表机构手里。从而立足党的实际制定了党在各方面的具体规矩，诸如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建立党的各级代表和代表会议制度、颁布干部理论学习的决议以及初步提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九月会议”及其制定的一系列规矩制度，为推动战略决战，打败国民党，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这不仅体现出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与党的实际相结合，突出党建理论的与时俱进务实创新，还为新中国党的规矩建设形成了很好的示范效应。

会议上毛泽东作了主题报告和结论，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全面总结检查了过去的工作，制定了全党的战略目标。会后，毛泽东向全党全军发出了著名的“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伟大号召。同时对建立人民政权、成立临时中央人民政府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次会议为组织进行战略决战，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做了准备。

在西柏坡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们一面紧张地指挥着惊心动魄的全国解放战争的同时，也在有条不紊地谋划着夺取全国革命彻底胜利之后建立新中国的大计。

“九月会议”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执掌全国政权提供了指导、做了准备，并对新中国的建设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

“九月会议”对新中国的政权性质进行了探索。在国体方面，首次用人民民主专政来规定未来新中国的政权性质，在会议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打倒三座大山的反动政权，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性质的政权。在政体方面，采用的是否定西方议会制的民主集中制。

在政府名称方面，为了与蒋介石独裁政府有所区别，党政军各级机关名称前面都要加上“人民”二字，真正体现并代表人民利益。“九月会议”还对新中国的经济构成和济政策进行了探索。提出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总体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在毛泽东的重要论著《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已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总方针了，但具体而系统地探讨这个问题却始于中央九月会议。刘少奇在大会发言时着重阐述了构成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部分，即居于领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并有小生产者加入的合作社经济；既有资本家，又有小生产者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具有自发倾向，既可以走向资本主义，又可以走向集体化、合作化的社会主义的个体经济；受工人监督，主要是为了国家和人民需要而存在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因为建立社会主义的客观物质条件还不具备和中国现代经济的不发达，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又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因此采取了在一定时期内保留资本主义经济的措施，以利于发展落后的中国经济。正是在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实行的照顾各方利益的稳健的经济政策，使得经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工农业得以迅速恢复，并使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展现出蓬勃的活力。

•指挥三大战役，为全国胜利奠定牢固基础

华东野战军向淮海战场挺进。

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线，直指锦州，实施“关门打狗”的战略方针。

中原野战军搭浮桥渡颍河。

三大战役的胜利，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制定建立新中国的各项方针政策已迫在眉睫。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旧址的会场正面墙上，两面鲜红的党旗中间，悬挂着毛泽东、朱德两位伟人的画像，会场整洁、朴素而庄严。轻轻抚摸主席台前的沙发和木质座椅，让人仿佛倾听到67年前那次著名会议上的历史回声。

1949年3月5日下午3时30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柏坡胜利开幕。在开幕会上，毛泽东做了题为《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规定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

鉴于中国共产党即将在全国胜利后转变为执政党，毛泽东在报告中预见到革命胜利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并说：“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

毛泽东在会议上所作的结论中强调指出要力戒骄傲。为了防止“糖衣炮弹”的腐蚀，防止为个人歌功颂德，会议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通过了几条没有写进决议的重要规定：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新中国的大政方针。为促进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迎接全国胜利的迅速到来，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保证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做了充分的准备。

七届二中全会是对中国共产党建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关键会议，为党中央顺利解决如何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怎么样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及确定工作重心转移以后的城市政策和任务等一系列重大和深远问题，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和思想准备。

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就要进京了。毛泽东要求各机关各部门，认真做好进城的准备工作，并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和规章制度。毛泽东办公桌上的日历翻到了1949年3月23日。这一天，毛泽东就要率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了。行前，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进北平就腐化了。我们进北平是要继续干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要教育干部战士，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毛泽东有些不舍地走出中央大院，和西柏坡的老乡们握手告别，踏上了进京的路途。

•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描绘全新中国宏伟蓝图

•西柏坡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前进力量

《中国书法报》和河北省书法家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会址前，重温入党誓词，庄严宣誓。

西柏坡精神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一样，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西柏坡精神由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是指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胜西柏坡期间，所体现和创立的一系列革命精神。由于它产生于中国革命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决定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所以它集中体现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彻底革命精神，体现了头脑清醒、目光远大的胜利者图强自律的精神。西柏坡精神，不仅是我们党，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特别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发扬光大。

一、两个“敢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进取精神。

1948年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提出了“打倒国民党”的战略方针。当时，人民解放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还占优势，还有美国的支持。党中央对“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可能性作了充分的估计”，敢于歼灭敌人重兵集团，敢于同敌人决战，当机立断，抓住有利时机，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了国民党赖以维护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1948年底，1949年初，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国际上有人提出“划江而治”的主张。在此风云变幻的关头，党中央、毛主席以敢于全胜的精神，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决不允许使革命半途而废。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进取精神，正是在这种实行战略决战、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宏伟实践中所形成的，这是一种抓住机遇，顶住压力，挑战，争取彻底胜利的革命进取精神。

二、两个“坚持”（坚持依靠群众，坚持人民参政）的民主精神。

1948年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决定“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为此，我们党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进行了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参战和生产的积极性，“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同时，党中央把加强纪律性作为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的“一个中心环节”，要求克服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党中央、毛主席特别强调，把加强纪律性与发展民主结合起来，采用民主集中制，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共产党领导下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长期合作，以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体现了一种确立党、政权、军队与人民群众的新型关系的民主精神。

三、两个“善于”（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科学精神。

西柏坡时期，毛主席、党中央面临如何建设新中国的艰巨而伟大的任务。在九月政治局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上，对新中国建设的国情进行了最初的基础分析，确定了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方向，并考察了新中国的主要矛盾和五种经济结构，规定了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提出了进城后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要求全党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很快地学会生产、商业、银行等技术和管理工作，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郑重地宣布：“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两个“善于”，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建设新中国”的道路问题进行最初的探索之中，极其鲜明地表现出来的一种按着中国的国情搞建设的科学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坚定信念和科学精神的高度统一。

四、两个“务必”（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创业精神。

在西柏坡，执政问题摆在党的面前。共产党人会不会变成李自成？能不能经受得住胜利与执政的考验？这关系到革命的成果能否巩固，社会主义目标能否实现，中国式的建设道路能否走下去。在解决这个重要课题时，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郑重地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主席、党中央强调执政党建设，提出“两个务必”，“就是要使它成为一个政治保证”。这里所体现的，正是一种无内功